



## 《白云山碑刻》序

张在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吃透榆林，至少要去三个地方：榆林城、统万城、白云山。

去榆林城，是看政治、经济。

早在四十多年前的初中时代，就从陕北同学那里，听到“榆林三迁”、“城里的老街石板路”等等关于这座塞外古城的言语。向迩往之近二十年，直到1982年才第一次踏进榆林城，不禁有些失望。后来，直到走完了榆林地区所有县城和不少乡镇；后来，直到看到台湾作家三毛自杀前写给贾平凹的信，其中一句醍醐灌顶的话是：“商州是没有的”。才猛地悟出：“榆林是没有的”，就是它了。

去统万城，是看自然和历史。

永远忘不了第一眼看统万城的惊悚和震撼，无垠无际的毛乌素沙漠旁，上游的无定河水静静的流淌，历经千余年的白色城堞兀立黄沙。在中国，要理解历史的沧桑，要理解“大漠孤烟直”、“秦时明月汉时关”，除过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戈壁中的楼兰、高昌、交河古城外，非统万城莫属，更不要说还有一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了。

去白云山，是看宗教和明清的榆林。

陕、晋、蒙三省界地的白云山史称“关西名胜地”，山上的道观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是陕西境内最大的古建筑群。白云山寺庙的200余通碑碣中，大量地刊载着明清两代的官员、乡绅和普通百姓捐资输力修

建白云山寺观和举行醮会的宏伟场景：

“下河冲木，山右输材，缙钱谷帛，辐辏云拥”，“中和、清和两节，香火会场，该地为四通往来闹热之场，何物神通，一至是邪”，“于今修醮会场，日夥日盛”。

“仙楼十二，牙整槛噩”，“钜细咸作，华室泰巖，蓬神崆奇，于兹观搏”。

“进香者雾集，瞻仰者云从，千商争至，百货杂陈”。

“岁岁来朝者，合山陝二西，服里口外，如出一辙，其香火之盛且久也”。

聪明的统治者懂得，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宗教是不能管的。喜欢，你可以支持，可以帮腔，但不能过分；不喜欢，你可以中立，可以旁观，但不能干预、镇压。两类极端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其结果都是出了乱子，轻则社会动荡，重则生灵涂炭。

在中国，软性的宗教，负载着普世的博爱和性善，一直在和社会的刚性和人性的野性较量，2000年来的拉锯战，此消彼长，互有攻防和胜负。白云山就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浓缩。

白云山的碑刻文字，除过宗教，还涉及政治、经济、天灾、人祸，不亚于半部明清时期的榆林史。看以下文字：

（康熙）“三年大旱，弃学为桔槔，三年大

在如此小的范围内惊现如此两处大范围的遗址，呈现出诸多的显著特点：均座落于富县中指原塬面上，地势平坦开阔，现不见距离较近的水源地，然而其共同特点都是一面或几面临沟。文化层堆积深；文化内涵都十分丰富；文化类型接近；采集到的陶器残片的器型、装饰也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两处遗址也均采集到了石器。那么在人口密度没有如今高的古代，

这两处遗址应有其内在的必然紧密联系。期待这两处遗址能为陕北延安地区富县塬面文化圈或者探求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提供更有利帮助。期望这两处重要的遗址能对延安地区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的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实物资料。

（调查人：范建国，齐飞舞，白宇明，史亮亮，翟媛）

雨，遂而为盖，又三年盗起，弃而学兵”。

（乾隆）“戊午之冬十一月廿有四日，白云山地面酉时起至次日卯时至地震十次，摇损殿宇房屋二十余所”。

“兼之嘉庆十五年后连年荒旱，民不堪命。”

“同治四年兴工，适陕回匪猖獗，窜及北山一带，逼近州城，至阻工程，至八年回气稍靖后，刘信士复来坐守督工”。

（宣统二年）“是年秋禾不登，兼之连年荒旱，遂尔终止”。

（民国二十七年）“陕北各县兵燹旱疫，偏灾叠构，死亡枕藉”。“自乙亥以来，赤祸遍地，延至丙子……”。

明清两代，榆林或陕北的自然和人文大背景是什么呢？

考古和地质资料表明，陕北自然环境的大规模破坏，始于秦汉，而恶化的转折点，在宋元。大自然动真格地对人类惩罚，则是在明清和近代。

14世纪以后，陕北的自然灾害渐趋频繁，而明初推行的卫所军人就地屯种更加剧了这一恶性循环，致使“地瘠民窳”的天灾人祸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解读明清陕北的物质世界，一篇天启进士马茂才的《备陈大饥疏》足矣。让我们看这些惨绝、腥浓的文字：

“自去岁（崇祯元年）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蓉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削树皮而食。诸树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食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蓄者，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毫不知涇，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饥而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最可悯者延安府安塞城西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粪土者，至次晨所弃婴儿，已无一生，而又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

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气薰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之外有不及掩着，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了解明清陕北的精神，《兰花花》、《五哥放羊》、《种洋烟》三首民歌可以概括。

陕北民歌的内容，除过那赤裸火辣、撩人脸红心跳的情爱和穷人的苦悲之外，种植、收获“洋烟”（鸦片）的辛苦和欢乐，三、四个妻妾之间的争宠吃醋也占有不小比例（经过革命的洗礼，后两部分内容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了），这几个方面，才构成了真实的陕北民间生活全景。

白云山寺观里供奉的道释儒三教神灵，面对的是双重的荒芜和野性——自然的和人心的，较量的结果必然败北。贫瘠的土地盛开着暴力之花，于是就有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有了其后的谢子长、刘志丹，从而改写了陕北、甚至中国的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将中国封建社会盛转衰的折点界定为明万历十五年。是不是有几分巧合，白云山第一座道观的动工，是万历三十三年，距这一折点仅十八年。又过了二十三年，陕北大饥，安塞的高迎祥拔出起事的刀，第二年，进士马茂才拿起上疏的笔。

使我悲观的是，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几乎每一次历史岔口的选择，都是最坏的一种。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假如高迎祥晚一年拔出刀……，假如马茂才早一年拿起笔……。

感谢王富春等先生，他们秉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历经十余个寒暑，对白云山寺观的碑碣进行整理，其“匡谬订诂之劳，钩沉较辑之功”，今天和后世，会有人记住的。

在读书风气日益衰微的今天，对于甘坐冷板凳著书者，自我安慰的办法是：一百年或二百年之后，哪怕还有一个人读我的书，就值。